

## 理论探讨

# 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

汪晓风

[摘要] 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广泛使用以概括国际政治总体特征的两个概念,而国际合作是两者共同涉及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图分析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文章首先对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概念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第三次争论”的背景作一简要梳理,这是国际合作理论得以拓展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然后从纵向角度论述这一进程中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这是一个现实和理论双重扩展的过程;最后提出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理论研究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 相互依赖;全球化;国际合作;国际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2) 02-0043-49

“全球化”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被集中关注的程度,很容易令人联系到7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另一个概念——“相互依赖”。尽管两者描述的现象都并非同时代的新鲜事物,但在各自的时代都受到了特别是国际政治理论学者的青睐。究其原因,既有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变化的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而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从70年代以来也不断拓展和深化。如果在宽泛的意义上将国际合作理论界定为“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国际合作理论是与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紧密相连的。本文将在相互依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

相互依赖与全球化:  
概念关系与理论背景

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特征,作为

表象和现实,人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感性认识,但作为理论层面的研究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并非平行的两个概念,甚至它们依然宽泛而模糊的涵义,“表达了人们一种粗浅而普遍的对于变动中的世界政治的感受”。<sup>[1]</sup>

相互依赖概念的提出和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广泛关注,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国际政治学者,不管是现实主义者,抑或行为主义学派,还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相互依赖来表述时代特征,“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sup>[2]</sup>“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格局正在崩溃,旧的口号日益失效。世界各国在经济、交流和人类理想等方面已变得相互依赖了”,<sup>[3]</sup>“方兴未艾的社会和经济交往正产生一个无国界的世界”。<sup>[4]</sup>相互依赖表达了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状态,是对不同国际行为者相互影响的一种特征表述,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

际交往所产生的结果。<sup>[5]</sup>

而国际政治的全球化特征,一般认为从罗马俱乐部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已被提出,但其受到广泛关注和集中讨论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概念来说,“全球化”表明这是一个国际社会联系日益密切、整体性日渐增强的过程,包含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这一进程也许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前后。但全球化也应当包含质的规定,即作为上述进程的结果—“全球性”,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在时间上要晚得很多。这种质的规定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和影响,二是现代性的全球扩展。

基欧汉和奈最近提出,可以从全球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关系。全球主义,是指世界各国都被卷入多个大陆的相互依赖网络的一种状态。全球主义是一种相互依赖,但全球主义有两个特殊的属性:其一,全球主义指联系的网络(多种关系),而非单一的联系;其二,一种联系的网络,如果被认为是“全球的”,必须是包括多个大陆之间的而不仅仅是地区的联系。<sup>[6]</sup>在某个固定时期,相互依赖既有可能增强,也有可能下降;而全球化则意味着国际联系不断增强的趋势。全球主义是一种历史久远的现象,而全球化是最近才出现的全球主义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必须区分“稀疏的”全球主义与“浓厚的”全球主义,只有“浓厚的”全球主义才可以被称为全球化,“包含了国际间各种各样的具有特定深度和广度的关系:持续大规模的远距离流动,对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sup>[7]</sup>无独有偶,1992年10月24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00周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罗斯特·加利郑重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开始了”,在这里,“真正的全球化”与基欧汉和奈所说的“浓厚的”全球主义无疑有着同样的质的规定。

相互依赖与全球化受到广泛关注,是与国

际政治理论的“第三次争论”密切相关的,国际合作是这场争论的重要议题。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次辩论,是所谓“国家中心”观点与“全球相互依赖”观点之间的对立。<sup>[8]</sup>这场争论最具意义的焦点触及国际政治的本质,矛头直指当时作为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用政治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政治的假设作为分析相互依赖政治的基础往往是不足的。”<sup>[9]</sup>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国家为权力展开的斗争,国家的利益根本上是相异的,在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冲突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合作则是有限的。<sup>[10]</sup>批评者们从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出发,试图对国际政治的本质作出重新界定,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正在失去或动摇其统治的根基,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意义日益下降,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存在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合作是理性的国家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方式。因此,国际需要合作,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合作的条件,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必须适应此种形势,采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对相互依赖、国际合作和国际规则等问题进行分析。<sup>[11]</sup>

#### 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 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轨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题材。国际合作理论也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国际政治学者们的青睐,这既是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对国际合作的客观需求和推进,也是国际合作理论本身的发展逻辑使然。一般地,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合作的内涵、实现途径、绩效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等等。

出于分析的需要及理论本身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间的多边合作、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初具规模,相互依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于这些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及如何实现的问题,现实主义理论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一时期的国际合作理论,首先侧重于对国际相互依赖概念与模式的分析。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在我们建立有用的概念之前,更不用说在加深对相互依赖以及国际制度演变的理解之前,必须冲出这混乱言辞的重围。”<sup>[12]</sup>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但是,相互依赖只有在交往活动产生彼此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存在,由于权力在相互依赖中发生作用,所以后者存在着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方面。<sup>[13]</sup>基欧汉和奈认为,现实主义的假定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政治现实,而用一种“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能够更真实地描绘国际政治现实。<sup>[14]</sup>约翰·斯帕尼尔指出,相互依赖模式与旧的权力政治模式有着根本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安全、均势、势力范围等高级政治问题,后者关注的是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等低级政治问题;前者将国家间关系视为冲突的“国家利益”,后者认为国家间是相互依赖的、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在具体法则上,前者是“你所得即我所失”的均势法则,后者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法则;前者偏好双边管理而后者倾向于多边管理;在具体组织方式上,前者是两极或多极的等级制,后者则更接近于平等主义。<sup>[15]</sup>这些论述侧重于对国际相互依赖的状态和权力作用的分析,由此引出国际合作的现实必要性及可能性。

肯尼思·沃尔兹则认为相互依赖并不必然促进合作:一方面,就现实来看,国际政治中的

相互依赖程度是很低的,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即使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高,也不会促进国际间的进一步合作,因为在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只能依靠自己,对于参与国际合作对自身独立可能造成的威胁,往往成为优先关注的重点,这种担忧超过对合作的期望,从而低估长期合作的收益,导致合作难以继续深入。<sup>[16]</sup>

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注意到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基欧汉和奈把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称为国际制度,并指出,尽管全球一体化还很弱,但就某些国家或许多国家在某个问题上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某些国际制度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sup>[17]</sup>随着国际复合相互依赖的增加和各国政策的变化,国际政治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国际制度,扩展国际制度的概念。这一时期新现实主义的途径成为国际制度主流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集中体现便是“霸权稳定论”和“霸权合作”模式。利特伯格认为,霸权稳定理论是“基于权力的国际机制理论的经典理论模式”,<sup>[18]</sup>霸权合作的基本途径是:霸权国建立霸权体系,并制定该体系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霸权国的实力与威望是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国际机制的重要前提,霸权国利用这些机制维持霸权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维持该体系,它愿意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容忍“搭便车行为”,霸权国的衰落或急剧变化会使该体系的国际机制发生相应变化。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扩大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侧重于深入分析国际合作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和途径特别是国际制度对于推进国际合作的意义。

前述霸权稳定论认为,世界稳定需要霸权,霸权国负责提供公共物品,这种超负荷的运作必然导致霸权国权力衰竭,失去霸权的世界将

重新陷入混乱。但 80 年代的现实没有为霸权稳定论的预言提供佐证: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未导致国际合作的灭亡,相反,这一时期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合作努力表明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条件下,国际合作依然是可行的。<sup>[19]</sup>

将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与国际制度联系起来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色。“为了理解国际合作得以发生的条件,必须理解国际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出现的。”<sup>[20]</sup>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制度理论逐渐成为影响巨大的分析国际制度的主流学派,<sup>[21]</sup>该理论用相互依赖的概念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整合意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实质,但合作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关系的和谐状态,国际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利益冲突和利益趋同并存。基欧汉专门指出,合作(cooperation)一词及其所表达观念在国际政治中有着特殊的涵义,它既不同于和谐(harmony),更有异于倾轧(discord)。和谐是这样一种状态,“行为者在执行追求与其它行为者无关的自我利益的政策的同时,也会自动地促进其它行为者目标的实现”,“在和谐支配的状态下,合作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或许意味着某些行为者共谋剥削其它行为者”。<sup>[22]</sup>而在倾轧的情况下,“各个国际行为体的政策被其他行为体视作实现它们目标的障碍”,<sup>[23]</sup>因而根本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国际合作的涵义及其必要性,“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合作与冲突共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合作是为了克服冲突或者潜在冲突的一种努力。”<sup>[24]</sup>这种界定既承认国际合作的困难,也指出合作的可能,而国家利益的趋同就构成了国际合作的基础。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运用博弈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分析了即便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政府,在利己主义者之间也能够产生合作,这样的合作必须依赖特殊性质的国际制度和国际

机制。基欧汉认为,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能够克服国际政治中始终存在的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推进国际合作,从而以一种霸权后的“制度合作”取代“霸权合作”。这些条件包括:建立一个明确行为责任的法律框架、提供完善的信息和零交易成本,而国际机制的存在正可以满足这些条件。<sup>[25]</sup>因此,国际制度是能够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

在这个时期,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理论,讨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和条件,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在方法论方面,采用系统层次的分析 and 演绎推理的方法,提出了以国际系统的进程解释国家行为的理论。但与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相似,它也是为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性霸权体系服务的。此外,它并未很好地解释阻碍国际合作的因素,如权力和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sup>[26]</sup>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世界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国际政治领域,两极对峙格局瓦解,全球相互依赖成为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国际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90 年代以来各种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异彩纷呈,在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上,国际制度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重点转向从实证角度具体分析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意义以及国际制度的效用,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表现在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

如果说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国际合作理论侧重于探讨国际合作机制得以创立的条件、国际制度的维持和变迁等方面,那么自 90 年代以来,有关国际合作的研究更趋深入,进一步关注国际制度的效用问题,特别是在国际环境领域。西方学者秉持了不同的研究途径,有的醉心于成本—效益分析和帕累托最优状态,设计出了可以直接套用的、计算不同环境机制效用的数理公式;有的看重纯粹的技术性因素对国

际机制效用的影响,如成员规模、决策程序等;奥兰·杨等则从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来讨论国际机制效用问题,并指出国际环境机制之所以能发挥效用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对具体的行为体进行角色界定,提高相关行为体的认知水平,对效用进行修订以及对国内各集团进行整合,并且向各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创新,也为人们理解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建构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的重大缺陷是忽视了对国家利益的形成过程和决策过程的研究,而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者的信仰、价值观和认识能力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一国在某一国际领域是否会采取合作或协调性政策时,应着重研究该国决策集团的倾向性选择。在国际合作问题上,建构主义重视合作的认知基础,强调集体认同在合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主观相互依赖和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一种建构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的关键在于将客观相互依赖转化为主观相互依赖。建构主义从调查国家如何理解其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利益入手,相关国家的认同和利益分布可以帮助理解合作是否可能产生。只要存在认知共同体,国家一开始就会倾向合作。”<sup>[27]</sup>温特指出,“担心被利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正常心理,相互依赖不能构成国际间集体身份形成的充分条件。国家只有在克服了这种心理之后,才能够进行合作。实际上,国际却是克服了这种心理:如果担心被利用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那么现代国家就根本不会有这么多的合作活动。”<sup>[28]</sup>温特进而认为,原因在于当今国际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而非霍布斯文化,两种文化角色结构相异,霍布斯文化的角色结构是敌对,而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sup>[29]</sup>洛克文化减弱了国际体系的自助特征,降低了处于竞争角色结构条件下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时被利用的代价,这种对其他国家

会实行自我约束的理解有利于形成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合作。<sup>[30]</sup>

有必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前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限于西方学者,大多是从维护西方特别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国际合作问题的。冷战后的研究,已逐渐突破了这一局限,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问题的探讨,已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参与进来。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也从介绍和评介逐步走向深入。<sup>[31]</sup>

一些思考:

###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合作理论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什么范围上和如何实现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和走向。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就国际合作的研究来说,至少可以从下面两个角度来考察:

1. 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全球化导致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在当今一个整体而又相互联动的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全球公共问题不是单个国家面临的个体问题,而是多个国家乃至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个人——国家——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的不是单边的而是多边的联合行动,不是单方面的个体决策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公共政策和规划。<sup>[32]</sup>

2. 国际协调、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中非军事政治领域的问题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合作在国家对外交往中的地位上升,这使得国家间的关系协调显得更为必要,需要推进国际对话与合作,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制度性安排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这就是国际协调与国际制度所关注的问题。制度性安排主要体现为国际

组织的建立与作用,有效的国际制度大都以某个或某些国际组织为载体。

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不再是国际合作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国际合作,也即国际合作的途径和效率的问题,它将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 全球治理问题。如上所述,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这在客观上提出了全球管理与治理的问题。在处理全球性公共问题上,仅依靠一国甚至几国的力量难以奏效,需要国际社会协力解决。国际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规范,但同时,国际制度在处理国家行为和国际社会的能力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国际制度本身是由国家创设的,其是否对国家具有实质性约束及这种约束可以达到的程度难以确定。<sup>[33]</sup>另外,现有国际制度存在着民主“赤字”,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主要国际制度的管理才是民主的,如何使全球事务管理与有效的民主责任相结合,将是学者和决策者面临的主要挑战。<sup>[34]</sup>

2. 国际合作的绩效问题。从国际制度的绩效引发出国际合作的绩效,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既存在成功的国际合作,也有失败的例子,更常见的是合作的结果往往与预设目标有偏差,这就涉及到国际合作的绩效问题。关于国际制度绩效西方学者已经有较多研究,一般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也有从国际制度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即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程度来分析。而国际合作的绩效,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制度的绩效,如何建立国际合作绩效的概念、分析框架,或许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3. 国际合作的价值取向问题。国际制度理论比较关注国际合作的实现途径和国际制度的功能,基本上不牵涉到价值判断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国际合作的價值取向,因为国际合作必然是为了实现国际行为体的某种利益,利益实现包含个体获益(国家利益)和

整体获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两个层面,应探索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个体获益和整体获益的均衡的途径,“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个体收益的总和接近国际整体收益的利益水平”。<sup>[35]</sup>另一方面,不同行为体在同一个合作过程中的获益也存在很大差异,其原因,既在于合作形式的差异,也在于不尽合理的制度安排。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国际合作能否实现和获得持久动力的关键。

4. 相异制度国家间的合作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来看,学者们侧重研究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能否以及怎样实现合作,所做研究甚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全球日益融入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不同制度国家的合作也日益增多,所以,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国际合作,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国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而发展,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中国正积极谋求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加强对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和把握国际合作,特别是在现在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下,选择何种方式加入国际制度,在其中寻求相对有利的位置,不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 [注释]

- [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 104.
- [2]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 [3] 亨利·基辛格:《一种新的国家伙伴关系》[M],1975年版,见上引书,第1页。
- [4] 里斯特·阿·布朗:《无国界的世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见上引书,第2页。

- [5] 基欧汉,奈,前引书,第7—10页。
- [6] See Keohane and Nye, *op. cit.*, p. 105.
- [7] *Ibid.*, p. 108.
- [8]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 [9] 基欧汉,奈,前引书,第5页。
- [10]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 [11] 王逸舟,前引书,第142—144页。
- [12] 基欧汉,奈,前引书,第5页。
- [13] 基欧汉,奈,前引书,第11—21页。
- [14] 该模式的特点是: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无法明确地划分等级;武力是一种无效的政策工具。见基欧汉,奈,前引书,第27—33页。
- [15] 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M],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 [1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 Wesley, 1979, pp. 120-160.
- [17] 基欧汉,奈,前引书,第44—73页。
- [18]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6.
- [19]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 [20]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8, p. 380.
- [21]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er Rittberger, *op. cit.*, p. 23.
- [22]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 51.
- [23] Keohane, *ibid.*, p. 53.
- [24] Keohane, *ibid.*, p. 54.
- [25] Keohane, *ibid.*, pp. 85-109.
- [26]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J],《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 [27] Ted Hopf, "The Prominenc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91-192, 见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后》[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
- [28]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版,第436页。
- [29] 温特提出,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存在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各基于不同的角色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三种文化对于国际合作具有不同的意义。上引书,第313—387页。
- [30] 温特,上引书,第436—437页。
- [31] 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欧洲》、《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学术期刊上关于国际制度的文章。
- [32] 苏长和,上引书,第6—7页。
- [33]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86-88.
- [34] Keohane, *ibid.*, p. 92.
- [35] 苏长和,前引书,第64页。

作者简介:汪晓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99级硕士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1-11-19